

我寫《時代七十年》的回顧

姜敬寬

壹

台灣大學周陽山教授從台北打電話到紐約，約我寫一篇短文，追述一下寫《時代七十年》的經過。當時未加思考，便一口答應，以為祇要回顧一些往事，便可交卷。沒有想到動起筆來，卻不是那麼簡單，要回顧的事實在太多，一時竟不知從何說起。

好則，篇幅有限制，截稿時間也有限制，多談也不可能，於是祇能談些比較重要而對寫這本書直接有關的經驗，以及構思的背景，希望對國內有機會看到《時代七十年》的讀者，對該書增加一些興趣與了解。

原來我在這本書的「作者序」中，曾經對寫作的基本動機，有所說明：那就是希望國內新聞傳播界的朋友，對於這個已有七十年歷史的新聞雜誌——它的創始目的、經過以及發展——有所了解，以便發展中國新聞事業時，有所借鏡和參考。尤其在這本世界歷史最久、美國新聞雜誌中發行量一直保持首位的刊物，它的特點以及對中國問題的報導，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，所以便撰寫了這一本書。

當然，這祇是我寫這書的目的之一。另外，促使我在百忙中抽空——祇能利用工作餘暇——來寫這本書的因素，還不止如此。

貳

其實對我個人來說，要寫這本書的主要因素，至少還可以數出以

下三個：

第一，在「時代」工作自一九六二年開始，到一九九二年六月已整整三十年，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它對我生活和思想的影響之大，更不言可喻。在這樣長的一段時間裡，爲了留下一些有意義的紀念，於是藉「時代」的七十週年（一九二三——一九九三）的機會，順便也給自己的三十年作爲一種里程碑，應該頗有意義。

第二，在「時代」的工作期間，經常有國內（包括台灣、大陸和香港）的新聞界人士前來參觀，由我爲他們導遊時，每次都會提出有關「時代」創始和發展以及現況的問題，使我不得不像錄音帶一樣，重複加以解釋，同時還附帶查詢最新的資料，於是當我決定寫這本書時，我就想到將來可以爲我自己再作導遊時，用來參考，或是介紹他們去找這本書來看。

第三，比較給我刺激最大的還是「時代」的改版，使我對雜誌內部的編輯負責人，發生了很大的懷疑與不滿，以爲他們要把這份刊物的生命革掉，於是便去重新閱讀「時代」的歷史，對原來的宗旨、編輯原則，以及它在世界新聞界所發生的影響，便有更深一層的了解，希望藉此可以向當時的主任編輯穆勒（Henry Muller）提出修正改版的建議。但是他的改版計畫已定，木已成舟，早已不再接受任何反對的意見，而我所蒐集的資料已很齊全，正好那時「天下出版公司」的社長高希均教授，也曾鼓勵我替「遠見」雜誌多介紹一些「時代」內部作業的情況，於是把這幾種因素合起來，我便決定把這本書寫出來。

參

一九九二年二月，當我把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的「中國的民主」（Chinese Democracy）一書用中文譯完之後，對利用早晨上班前早起時間來寫作已經養成了習慣，因此便接著動手正式籌畫撰寫《時代七十年》，結果發現自己的寫作反而比翻譯更加順利，在每天預定的時間內，竟能更有收獲，寫作的進度也更快。

關於寫作的資料，我是一邊從「時代華納公司」的圖書館及特別

的收藏室去找尋，另一邊則隨時在辦公空餘的時間，尤其是週末及假期，便去訪問我所認為對「時代」有貢獻的退休編輯或研究員，譬如曾經作過我上司的國際版主編柏恩波姆（Jesse Bimbaum）和早已退休的維加斯女士（Marylois Vegas）便都曾為我提供過許多寶貴的資料。

另外，我在寫作的前後，也得到時代華納總編輯麥克曼納斯（Jason McManus）、「時代」週刊的發行人伊麗沙白·佛爾克（Elizabeth Valk）以及國際版現任主編布拉格（Karsten Drager）等的支持與鼓勵，後者並用英文為該書寫序，加上其他同事也義務地替我找適用的圖片，免費供應放大，都為這本書增光很大。

肆

經過大約一年（一九九二年七月至一九九三年六月）的時間，我就將初稿完成，然後寄交「天下文化出版公司」，由杜晴惠女士負責主編，到八月底以前即已正式出版，實在是出乎意料外的順利，真沒有想到她們工作的效率會如此之高。

回顧寫《時代七十年》的經驗，使我有兩點主要的感想：第一，寫自己所熟悉的題目，是最理想的事，不僅可以有勝任愉快的感覺，而且工作效率上也能事半功倍；第二，從「時代」的發展經過來看，目前的電子媒體雖然有很大的優勢，但在將來的新聞傳播界，印刷媒體—包括像「時代」一樣的新聞雜誌，仍然是有其不可取代的貢獻的，主要原因就是各有各的特點，正如電視並沒有取代無線電廣播是一樣的道理（94/1/24）。